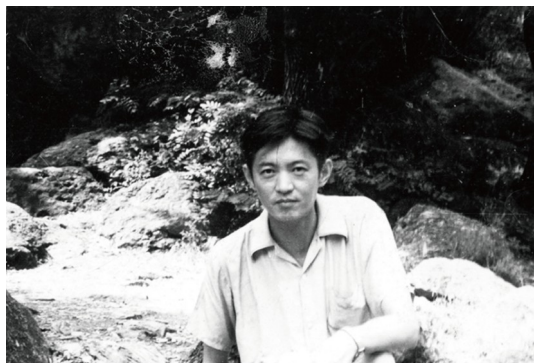


追求真理、讲真话的邹承鲁

邹宗平*

(李四光纪念馆, 北京 100081)

今年是我父亲邹承鲁诞辰100周年, 他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事业。从1951年博士毕业回国参加工作, 到2006年去世, 他在酶学研究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发表过一百多篇科学论文。晚年, 他渐渐淡出科研工作后, 又致力于反对学术腐败, 维护科学尊严的工作, 先后发表过50多篇文章。



“说真话, 说实话”是邹承鲁科研生涯中的一贯做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他曾对科学院的领导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对科学研究体制存在问题的看法。从科学院的“学习李森科(苏联科学家)”运动之后, 他更加迫切地希望“科学由不懂科学的人管理”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地改变。他提出: “一个人必须是科研人员, 才可以兼任院长、所长。而担任领导工作的科研人员, 至少应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如果有一天, 出现了‘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沫若’和‘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四光’, 那么科学研究工作将会气象一新。”他还提出“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 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是先生选学生, 学生选先生, 自由恋爱, 自由结合。”

他的这些讲话, 当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

烦, 几乎断送了他做科学研究的权利。六十年后的今天, 回过头再看他当年提的建议, 很多都已经实施, 成为学生们习以为常的找工作和考研究生的方法。

1977年8月, 作为科学家代表, 邹承鲁和另外12位科学家、13位教育家以及科学教育口的领导共33人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 他和其他参会者先后发言, 主张立即停止当时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大学招生方式。这种方式, 除了可以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外, 一无是处。应当尽快恢复高考制度, 高等院校的专业分工不宜过细, 特别提出要在高校教育中, 重视基础教学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党中央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 决定马上改革高校的招生方式, 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因为要推翻原来的招生方式重新来过需要一定时间, 1977年的高考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全国约有570多万名青年参加考试, 包括了自1966年高考停止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1年中, 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这为他们提供了靠自己努力, 通过参加考试公平竞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批考生大多数都成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通信作者: E-mail: pingstt@qq.com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腾飞。国家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不断加大，科研机构和设备也因此得到更新，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的研究室都拥有了世界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所有这些都是在邹承鲁1951年回国时想都不敢想的。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本不应该在科学界这片净土上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开始冒头。一些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科学研究，而是企图用抄袭、伪造数据、作弊来骗取国家的科研经费和不属于他们的名誉。对这些科学界的腐败现象，邹承鲁一直是旗帜鲜明地写文章、作报告、接受电视采访，用各种方式揭露和反对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其实，邹承鲁一直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曾经有一次，媒体找到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说可以在新闻中介绍、宣传实验室的科研成就，但是要缴纳一定费用。实验室主任邹承鲁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我们做科研不是为了追求新闻效益，不做花钱买出名的事。但是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他一反常态，主动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通过媒体抨击那些科学界发生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没人出来反对科学界的腐败，那么搞腐败的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中国的科学就永远没有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牛满江事件当时在科学界很是轰动。牛满江是继杨振宁教授之后首批少数访问中国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之一。他1962年获得坦普尔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对胚胎分化诱导作用的研究。经过研究实验，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瘤细胞内之后，观察到了癌细胞的生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现象，并就此现象发表过多篇文章。这项工作一开始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一些实验室重复了他的实验，但经多次重复却不能得到牛满江的结果。这些实验室开始对牛满江文章中的发现提出质疑。牛满江继而转向当时科学水平远落后于美国的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台湾的许多媒体都在显著的位置上刊登关于牛满江科研成果的报道，认为牛满江的实验作为癌症的克星已接近成功。在台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牛满江又把目光转向内

地。1973年，牛满江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同机到达北京，开始他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7年和1978年人民日报两次发表长篇报道，称赞牛满江和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他们为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的贡献，对于农业医学和科学等将具有指导意义”。从1973年到1982年，关于牛满江的报道在国内经常见报，各级领导会见牛满江不下16次之多。牛满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科学家，很多人认为他早已获得了诺贝尔奖。邹承鲁对这种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还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没有得到国际同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之前就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追求“新闻”价值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科研作风和科研道德的问题。其实早在1974年，这项成果就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迄今为止无人能重复他们的实验结果。

1980年，牛满江向《中国科学》投了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中指导肝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并附有当时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中国科学》予以发表。那时，邹承鲁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普通编委，他对这种凌驾于科学真理之上、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左右科学成果的鉴定和科学论文发表的做法非常反感。但是他毕竟不是牛满江的小同行，无法对牛满江的工作做专业的评价。牛满江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知名发育生物学家戴维斯撰文对牛满江的论文提出批评意见。邹承鲁向《中国科学》主编建议刊登戴维斯的文章，虽经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得到批准。1980年，邹承鲁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一文，文中提到：“开展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争辩，是繁荣科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违反这一重要的原则，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牛满江知道邹承鲁建议在《中国科学》上刊登戴维斯的文章后给邹承鲁写公开信表示不满，信上说：“如果你可以请外国人来稿批评我们，难道别人就不能向你学习做同样的事吗？”邹承鲁收到信后，立即写信给《中国科学》的编辑，建议在杂志上发表这封信。在整个事件中邹承鲁也考虑过后果，因为得罪了科学

院的领导，他甚至做好了被从1980年院士增补名单中拿掉的心理准备。但是大多数科学家在维护科学尊严的立场上和邹承鲁是一致的，这个事件并没有影响他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

现在人们都很注意养生，又缺乏吃多了有害的常识，什么都补，以为补的越多越好，所以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巨大，许多商家也看好这个巨大的商机。珍奥核酸公司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推销他们的核酸营养保健品。为了让珍奥核酸公司的产品占领更多市场，珍奥核酸公司邀请学者和生化及分子生物学学会等研究核酸的专业人士为他们做宣传。2000年，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以生化学会工业生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名义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介绍核酸营养的文章。看到文章后，邹承鲁马上写信，告诫这位高级工程师，不要用学会头衔发表这类文章，替商家说话。珍奥核酸公司知道后，专门派人来找邹承鲁，又是送珍奥核酸公司的资料，又是邀请邹承鲁到大连珍奥核酸公司总部去参观，所有费用公司全包。邹承鲁当然是不会去公司总部的，但是送来的三本资料他看了。其中一本是中国科学家讲核酸营养的文章，一本是日本科学家关于核酸营养的文章，还有一本是欧美科学家关于核酸营养的文章。看完这三本资料，邹承鲁发现，所谓的中国科学家都不是做核酸研究的；日本科学家邹承鲁虽然不清楚，但是所引用的文章都不是发表在正规学术刊物上的；而欧美科学家的文章内容根本不是讲核酸营养，而是讲核酸性质、核酸代谢等。这三本所谓的资料，全部都是唬人的。针对珍奥核酸公司的公关，邹承鲁也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第一，核酸到处都有，正常饮食中一定不会缺乏核酸。所谓营养，指的是补充缺乏的东西，不缺乏就不需要补充，就无所谓什么营养。第二，核酸类物质吃得过多是

有害的，对于痛风病人尤其如此。痛风病是由尿酸在关节处结晶而致，而尿酸正是核酸的代谢产物，所以痛风病人严禁服用核酸含量高的食物。

邹承鲁特别反对学会等科学组织为商家做广告。因为这些组织做广告欺骗性更大，影响也最坏。在他担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期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通过一个决议，不允许任何会员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名义做广告。邹承鲁在《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一文中说：“科学家不应出面做广告，否则，你的那番‘广告词’难免有悖于科学真理之处。至于一些企业利用科学家为自己的虚假产品做宣传，或个别科学家出卖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和良知，为伪科学在企业界的泛滥助纣为虐，则更应该引起科技界的高度警惕。”

科学是及其严肃的，科学家的天职是追求真理，作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讲真话。邹承鲁无愧于“科学家”这个神圣的职业，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追求真理、讲真话的人。



资料摘自：《邹承鲁传》《邹承鲁杂文集》